

# 论文化语境下异化、归化翻译策略之最佳平衡点<sup>①</sup>

杨思慧, 胡东平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6)

**摘要:** 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译坛上, 归化和异化的交锋早已成为一个非常激烈的话题。我们有必要对归化异化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进一步的梳理, 再将其放置于文化视域下进行分析, 可以找到异化归化的最佳平衡点。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动态的发展中, 异化归化的最佳平衡点也相应随之变化。

**关键词:** 异化; 归化; 文化语境; 最佳平衡点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1-0137-04

## On the Optimal Balance Point of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Cultural Context

YANG Sihui, HU Dong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5)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discussion about and the research into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translation circle from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the optimal balance point between the two strategies, of which the dialectical unity has been concluded from the aspects of linguistic form and cultural issue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t is seen that “the degree” of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degree of cultural convergence” and “readers’ receptivity”. In the dynamic changing of culture, the optimal balance point is changing therewith.

**Key words:**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cultural context, optimal balance point

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译坛上, 归化和异化的交锋早已成为一个非常激烈的话题。面对如此针锋相对、分歧巨大的观点, 读者虽然觉得各派的观点都言之有理, 但要进行比较和取舍, 却又觉得无所适从。笔者认为, 有必要对归化异化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进一步的梳理, 再将其放置于文化视域下进行分析, 可以帮助找到异化归化的最佳平衡点。

### 一 中西译坛对翻译异化、归化之研究

1813年, 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 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

不动, 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 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 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sup>[1]</sup>施氏对翻译的两分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1995年,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将施氏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 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韦氏对归化翻译的定义是: 译文遵守目的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 公开地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 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需要。他对异化的定义是: 使译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 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sup>[2]</sup>他强烈反对归化翻译法, 主张异化翻译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10-08-30

**作者简介:** 杨思慧(1985-), 女, 湖南醴陵人, 湖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硕士,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胡东平(1964-), 男, 湖南益阳人, 湖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法,“号召”译者们拿起异化的翻译武器来抵制英美文化的霸权主义行径。<sup>[3]</sup>韦努蒂提倡异化翻译法是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中提出来的,在具体历史环境下有其积极的意义。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可谓是归化派的典型代表。奈达说:“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sup>[4]</sup>“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这一说法成为他归化翻译的理想。奈达还提出“读者中心论”,认为读者的反应才是译文的终点。这些观点强调了译文要自然,通顺,要为读者着想,但这都是奈达从《圣经》翻译的实践出发提出来的,追求译文效果与原文效果一致,不具有普遍适应性。

西方译界关于异化与归化的理论在90年代后期引入中国。目前,国内发表在外语类刊物以及一些大学学报上有关异化与归化的论文很多,其中,赞成异化和归化者各执一辞,当然亦不乏折中者。

孙致礼教授在《中国翻译》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的论文,预测21世纪文学翻译的走向将以异化为主导。他提出,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但异化/归化似乎更加“原则化”,也更便于把握。他提出了异化与归化的“适度”原则,指出“归化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上,在‘文化层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sup>[5]</sup>

蔡平教授却提出,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国读者通过本国文字了解他国文化,所以译文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要符合译语规范,这样才能让读者理解,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归化法将始终处于主导地位”。<sup>[6]</sup>

郭建中对归化和异化的使用持一种辩证的看法。他认为,从作者的意图、文本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这四个可变量因素来考虑,“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價值。就翻译异化和归化的问题,多数人都片面地承认其中一种翻译策略而否认另一种,没有综合多种影响因素辩证科学地去寻找一个平衡点,即异化或归化的“度”。对异化与归化平衡点进行纵深挖掘,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 二 异化、归化之辩证统一

异化派和归化派之所以存在分歧,是因为他们各自讨论的侧重点不同。异化派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证其观点,如韦努蒂、孙致礼;而归化派多从读者接受角度(语言层面)来看待此问题,如奈达、蔡平。因此,综合考虑各方面要素来权衡归化异化的“度”

是有效路径,只有认识到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优势,克服劣势。这种有机结合就是:在文化内容上,采取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在语言形式上,采取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

### 1. 文化层面:异化为主,归化为辅

翻译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文化传播,而传播的又是异域文化,因此,翻译就应该采取异化策略。举一英译中的译例说明文化内容的层面上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合理性。例如:

Among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king.

(1)盲人国里独眼为王。

(2)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Every bean has its black.

(1)每一个豆子都会有黑点。

(2)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译文(1)采取的是异化策略,译文(2)采用的是归化策略。显然,译文(1)将译出语的文化意象也移译过来了,且不会对读者的理解造成困难,所以更加合理。客观上它还为汉语的表达开拓了新的境界。

但是,要百分之百地保持文化的异化,又是不现实的。因为在文化交融的历史过程中,总会碰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相距太远,有着直接冲突、无法调和的情况。此时,如果一味坚持文化的异化,只会带来负面的效果,我们应该灵活处理,不妨采取归化策略。例如:

He is too old a dog to learn new tricks.

(1)他是一条老狗,学不了什么新道道了。

(2)他上了年纪了,学不了新道道了。

译文(1)属文化层面上的异化翻译,译文(2)却在文化层面上进行了归化处理。两个译文孰优孰劣不言自明。“狗”在西方文化中是具有褒义或中性的词,例如,英文中有 lucky dog(幸运儿);dog可以直接表示“伙计”。而在汉语中“狗”却具有贬义,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忠实走狗”、“狗苟蝇营”、“狗傍人势”、“狗党狐朋”等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因此,译文(1)明显偏离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情感。此时的异化翻译策略,势必导致“文化失真”,归化的策略在此更加适合。

由此可以总结:翻译在文化内容上以异化为主,方可保证译文的“异国情调”、“原汁原味”,一定程度上为目的语创造了新颖的语境;在文化内容上以归化为辅,则避免了跨文化交际当中的冲突和误解。

### 2. 语言层面:归化为主,异化为辅

只有极少数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源语

的语言形式,在语言形式上强调异化为主的策略。例如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强调“宁信而不顺”的异化翻译原则,就是以借外语表达方式丰富本族语为目的。翻译的首要目的应是为了传达原文的信息和文化内容,语言上的障碍势必会影响对原文信息和文化内容的把握。汉语的结构具有“意合”的特点,它更多地依赖于语义的搭配来反映词语的种种组合关系;而英语注重“形合”,句子各个成分间都有适当的连接成分表达它们的相互关系。<sup>[7]</sup>在英译汉时,译者必须把握这种差别,使译文流畅自如,避免生硬累赘。例如:

“Well, sister, it's only two - and - nine piece, and poor Becky will be miserable if she don't get one.”

(1)“姐姐,字典才值二先令九便士,可怜的蓓基拿不到一本,心里岂不难过呢?”

(2)“……而可怜的蓓基,如果拿不着一本的话,她会难过的。”

译文(1)在语言形式上采取的是归化策略,译文语言形式没有和原文完全对等,比如原文中的衔接成分“and”“if”在译文(1)中都找不到对等成分,但它运用了符合译入语的流畅自然的表达;译文(2)中“and”译作“而”,“if”对应于“如果”,将衔接连词一一对应地译出,不顾汉语“意合”的特点,一味追求语言形式的异化,显得不自然。

当然,在语言形式上以归化为主,可保证译语的可读性和流畅性,是实现翻译首要目的的前提和保障;但翻译也是本族语吸收新的表达法,促进本族语发展的途径之一,所以在语言形式上以异化为辅,则可以增加译语语言的异域性和新奇性,丰富译语语言,给译语读者带来陌生感和新鲜感。汉语中有很多从外语异化过来的表达方式经过历史的沉积,已经完全被接受。比如“武装到牙齿”、“一石二鸟”、“酸葡萄”、“鳄鱼的眼泪”等表达法,都是从“armed to teeth”,“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sour grapes”、“crocodile's tears”等英语到汉语的异化词。在英语中,也可以找到 kongfu、kowitz、typhoon、jiaozi 等单词,它们是由“功夫”、“磕头”、“台风”、“饺子”等汉语的英语异化词。

在文化和语言两个层面,当一种为主策略行不通时,就得借助为辅的策略。只是,在“为主”和“为辅”之间存在一个“度”的问题<sup>[8]</sup>。“归化”“异化”的“度”要取决于“文化趋同的程度和读者的现实接受能力”<sup>[9]</sup>。民族差异性虽然不可避免,但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化融合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文化本身的渗透性和开放性,文化趋同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且,现在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接

受能力较之过去相比要高得多,对异域文化的心态更加开放、包容,所以归化异化的“度”也会随之呈现动态的变化。

### 三 最佳平衡点之确定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总体上来讲,应在文化层面上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语言形式上,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依据此原则,结合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的交流情况,可以从文化趋同的程度和读者接受能力这两个因子来权衡考虑异化和归化策略在文化和语言两个层面的度,现分以下三种情况来寻找异化归化翻译策略的最佳平衡点:

(1)当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交流匮乏,趋同程度较低时,文化层面的异化必须有所消退。当然语言层面的翻译策略仍以归化为主,因为文化趋同程度直接影响读者的异域文化接受能力,此时的读者接受能力较低。

在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下,明清政府执行“闭关锁国”政策,盲目排斥外国的一切东西,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更谈不上与国外有文化方面的交流沟通。中英文化差异很大,读者的接受能力相应也低,甚至还有抵触异域文化的情绪存在。自从战争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一批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落后是由于“作茧自缚”,没有学习到西方的优秀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到清末时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家,譬如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他在序文中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僭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不悖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变发挥,实非正法。”他在翻译中添词加句、故意不译、漏译、曲译、篡改等,并且往往就原著的某一思想,发表自己的见解,大加按语,运用自己的先见,前理解去“阐释”西方文化视域下的问题。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相当成功,“不仅影响了严复的同辈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影响到严复的后一辈人物如吴玉章、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毛泽东等,而且影响到鲁迅等人以后更年轻的一代”<sup>[10]</sup>。

(2)当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处在激烈的融合期,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有意识地靠拢时,文化层面和语言层面的异化都会增长,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完成翻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使命。但由于读者的接受能力在文化融合期时也十分有限,所以异化的增长不能过度。

五四时期,翻译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欧美

各种文学理论、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纷至沓来,许多文学翻译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大量涌现。正如郑伯奇曾经描述的那样,十年之内,“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的而又很杂乱的出现过来。”<sup>[11]</sup>五四时期可以说是各种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交融磨合的时期,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了《域外小说集》,忠实地保留了原著的内容、文采以及章节格式,开近代文言直译小说的先河。在《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他指出:《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也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当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所在。<sup>[12]</sup>鲁迅与周作人对原作采取“忠实”的态度,主张“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其目的是借鉴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在艺术上也广泛汲取各种流派的精髓,为惰怠、混乱的旧文坛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构造出全新的文学和文化规范。<sup>[13]</sup>而《域外小说集》二册合共只售出四十本,销量奇差<sup>[14]</sup>。这主要是因为本来周氏兄弟译《域外小说集》针对的读者就是一部分“精英分子”,而译作异化的程度超出了其他普通大众读者的接受能力,这也就难怪其译作的“失败”。鲁迅先生的前瞻性劳动收获的却是失望,给我们一个教训,翻译策略的“异化”“归化”之间的“度”要审时度势来确定。

(3)当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通过磨合文化趋同程度较高时,文化层面和语言层面的异化可以增长较多较快,因为读者接受能力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影响下也会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交流手段的日益多样化、普及化,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文化差异性逐步缩小,文化趋同程度较高,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抵抗情绪降低,越来越能够包容陌生文化,读者接受能力相比之前大大提高了。文化层面上,汉语当中有一部分带有浓重文化意蕴的词通过音译的方式异化成英语后,成了英语国家普遍接受的词汇。例如,zongzi/ Tzung Tzu(粽子),Fuwa(福娃)等就比起归化而来的表达法 glutinous rice dumpling, friendliness 使用频率更高;而且语言层面上也有由汉语异化过去的句式成为英美国家惯常使用的句式,像“Long time no see.”这句打招呼的用语就是从汉语“好久不见”异化翻译过去的,还有汉语中主题突出的句式特点也被英语吸纳,使得该句法广泛出现在英语当中。

例如:这本书我已经读完了。

(1) This book, I have already finished.

(2) I have already finished this book.

句(1)当中 this book 不是句子主语,而是主题。句(1)这样的句式在英文当中现在已经十分普遍。

翻译中异化和归化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在目的语文化中起着不同的作用,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在文化层面上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语言形式上,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在此原则下综合文化趋同的程度和读者接受能力进行权衡选择,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个点绝不是异化和归化之间的终点,而是随文化的动态变化而变化的。对这个点的深入探求,有利于我们找到科学的理论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而当前国际国内译坛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异化归化孰优孰劣之争了。

#### 参考文献:

- [1] Schleiermacher, F.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C]// R. Schulte & J. Biguenet.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 den to Derrida*.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6-54.
- [2] Venuti, L. *Strategies of translation* [C] // Baker, Mona.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240-244.
- [3]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45.
- [4] 尤金·奈达.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4.
- [5]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 中国翻译, 2002(1).
- [6] 蔡平. 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 中国翻译, 2002(5).
- [7] 周艳. 译文的归化与异化[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8(3).
- [8] 张智中. 兼容并蓄, 双层操作——异化归化之我见[J]. 语言与翻译, 2005(2).
- [9] 谢应喜. 从文化趋同看归化和异化[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1(4).
- [10] 皮后峰. 严复大传[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23.
- [11] 刘舒展, 王冰. 浅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J]. 学术论坛, 2008(6).
- [12] 鲁迅. 鲁迅全集(十卷)域外小说集·序言.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2.
- [13] 黄琼英. 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下的鲁迅翻译[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04(1).
- [14] 鲁迅. 鲁迅全集(十六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67.

责任编辑:卫 华